

透視郭沫若

(下) (本文插圖刊第61頁)

● 姜 穆

認識安娜艱苦維生

在日本，郭沫若認識了一生中的第三個女人佐藤富子，也是後來改名安娜的郭沫若的日本妻子。

一九一六年八月，在東京一所美國教會醫院任職的佐藤富子，偶然結識了郭沫若，兩人一見鍾情。當時郭沫若正處在愛情空虛期，四年前，他在家鄉同一個名叫張瓊華的女子結婚，然而張氏的相貌、舉止與他心目中的女神形象相距甚遠。

如今，面對溫柔多情、純潔可愛的富子姑娘，郭沫若陶醉了。他們共同立下山盟海誓。然而，富子萬萬沒有料到，她那當牧師的慈父，看到自己的女兒要嫁給一個異國的有婦之夫、一個不信上帝的異教徒，竟然把她趕出了家門。

愛情是偉大的，也是盲目的。佐藤富子流着傷心欲絕的眼淚，永遠地離開了自己的父母和家族，改名郭安娜，投向郭沫若的懷抱。

從第一次見面到共賦同居，僅僅四個月時間。婚後，郭安娜靠幫人洗衣服的微薄收入，維持家庭開支，並幫助郭沫若繼續求學。

孩子一個接一個出世，他們的生活更加拮据

，郭安娜甚至通宵達旦地洗衣服，以求多賺幾個錢。一九二三年春，郭沫若學成回國，郭安娜也帶着孩子們一起來廣州。不久，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在這段時間，郭安娜孤身帶着幾個孩子在上海、廣州、武漢到處流浪。當她獲悉大革命失敗，蔣介石總司令親自下令通緝郭沫若的時候，又長途跋涉到丈夫身邊，並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舉家回到日本故土。

當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東京警視廳的憲兵們經常上門找麻煩，每一次都是郭安娜與他們周旋，同時，還要忍受鄰居的白眼，同學的譏諷——他們認為郭安娜嫁給一個通緝犯是靠不住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後，經陳布雷在蔣介石委員長面前多方疏通，蔣考慮到抗戰需要人才，便責成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日本問題專家王芃生及駐日大使許世英等，安排郭沫若秘密回國。由於當時中日關係正處在微妙時刻，郭沫若的走和留都是中日兩國政界和文化界十分關注的問題，為了防止節外生枝，蔣委員長甚至沒有撤銷對郭沫若的通緝令。郭沫若最先知道回國有望的消息是郁達夫寫信透露的，他並沒有告訴郭安娜，起初他擔心的是沒有加入中國籍的妻子

不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而投入「敵國」。後來他進一步獲悉，中國「最高當局」的安排中，從一開始就把郭安娜和孩子排除在外。在祖國和家庭執重的抉擇中，郭沫若選擇了前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郭沫若悄悄離家歸國。郭安娜和孩子們還在睡夢中，當她一覺醒來，只見桌上留有一張字條：「安娜，我要走了……也許是一次短暫的分別，也許這將是一次永訣……」下面還有兩句話，是郭沫若寫給最喜愛的六歲兒子的：「鴻兒，我希望你能無病息災地成長起來！」與此同時，郭沫若在專人護送下，已從東京來到神戶碼頭，躲過憲兵耳目，平安登上了去上海的輪船。望着滔滔江水，他為了自己的負心感到難以言表的惆悵，揮筆寫下了一首後來傳誦甚廣的七言詩：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剛離開日本，郭安娜就被抓進了監獄，受盡了非人的折磨，身上傷痕鮮血淋漓，沒有水喝，只有一些長滿綠毛的發霉食品。

他既已「別婦拋雛斷藕絲」，回國不久，就和于立羣閃電般地結合了。

爲了他的日本太太，郭沫若在民國七年，還曾被人加上了漢奸的徽號。那是他在六高畢業之時，留日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約」，發動全體罷學，同時還組織了一個「誅漢奸會」，凡是有日本太太的學生都被認爲漢奸，這本是幼稚的民族心底表現，但在當時確也雷厲風行，有不少留日學生有日本太太的，因而離婚者不少。郭沫若其時已有了一個五個月的兒子，他沒有離婚，也沒有隨衆返國，因此被罵爲「漢奸」，這頂帽子戴在當時的郭沫若頭上是非常冤枉的，不過，郭沫若自己的解釋，也極可笑，他在「創造十年」（是自傳的一部分）中說：

「全體罷學的抗爭支持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所反對的協約沒有因而取消，更連發表也沒有發表，於是乎便又生出了全體回國的決議。這一決議下來，凡是有錢在手的人回國了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樣的『漢奸』每月所領的官費要養三個人口的，平時所過的就是捉襟見肘的生活，那有什麼餘錢來做歸國的路費呢？沒有錢便失掉了『愛國』的資格，『漢奸的徽號頂在頭上』就好像鐵鑄成的秦檜一樣。」

「史劍批評說：留學生官費並非是太太生兒子之用的，三十二圓養活三個人，何嘗能成爲理由！當然，不回國並非就

表示不愛國，但用這樣的理由來洗刷『漢奸』的惡名，似乎也太薄弱」。這批評非常中肯。

接近文學獵官獵名

一位學醫的學生，怎麼又與文學結了不解之緣了呢？只因日本醫科是以德國爲師的，所以要學德文與拉丁文，而教本都用的文學作品。這樣一來，他雖然讀醫，也同文學院的學生一樣，接觸了很多西方的文學，尤其是德國文學。沒想到學醫不用醫術濟世，却以文學作爲獵官獵名的工具。這正符合了郭沫若的投機性格。

郭沫若的文學生涯是從「學燈」出發的，詩人宗白華刊登他的作品最多，他在新詩中應當是佼佼者。史劍評他時說：「他的創作風格，不同於胡適，亦有異於沈尹默、劉大白、康白情諸人，他的詩作綜合了中國底與西洋底風味，而且，在詩中插入外國字，郭沫若也是第一人。但是，在思想上，他當時是把捉不定的，日本文壇的左傾思想，對他没有發生影響作用；而中國文壇上的左傾幼芽，李大劍在新青年第五卷六期（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兩文，歌頌俄國革命，郭沫若又根本不曾看到。他在創作的初期（一九一九—二〇）

的詩作經過」一文中自承受了泰戈爾、歌德、惠特曼、海涅諸人的影響，帶着很濃厚的泛神色彩。」

結識田漢開始左傾

那時他只是一位鋒頭主義者。郭沫若對文學還沒有太深的認識，最初也不過是想從投稿中獲得金錢上的利益罷了。領他走上文學這條路的第一位是宗白華，另一位是學礦學的張資平，他們可以說，都是郭沫若文學上的啓蒙老師；而把他領向左傾的路上的，應當是田漢（壽昌），宗白華把左傾的田漢介紹給郭沫若，對他往後的生活、思想，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當時共產主義已經在日本與中國萌芽。中國是在列強瓜分野心下的倖存者，中國知識分子莫不想尋找一種救中國的良藥，三民主義固然是一種，但共產主義也可能是另一副良藥。

因此年輕人不是信仰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也以此爲時髦，爲前進者不少。誰願意當落伍者呢？再說愛國是青年當然應有的品格，對共產主義毫無認識的郭沫若，在田漢的影響下，左傾就並不意外了。

攻擊魯迅作登龍術

無可否認，郭沫若在文學上是有些才華的，不過也只限於新詩、戲劇與歷史的考證文學。

文學上，詩方面，以「鳳凰涅槃」、「女神」爲代表作，史劇則是「棠棣之花」，考證方面

，全收入「十批判書」一書之中。對於歷史學方面，他以唯物觀點批判古人，自有另一番看法，在這方面他是有些成就。但他的小說，散文則無甚可觀。在小說方面，已印行的有「塔」、「橄欖」、「落葉」、「地下的笑聲」等。沈從文在「論郭沫若」一文中，曾經說：「在文學手段上，我們感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筆適宜於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篇通電，而不適宜於小說。」也就因此一批評，郭沫若於共產黨即將席捲大陸之前，在香港批評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並指他在「戰國策」上發表文章反對作家從政一事，扣上「反動」的帽子，使沈從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受了幾十年罪，這大半出於郭沫若的報復。他自成名以後，連魯迅也不放在眼裡，除了老天就是他郭沫若了，而他也以攻擊魯迅作為登龍術，這也是他和魯迅終生未見過面的原因。

在日本，郭沫若曾和張資平商議辦文藝刊物，但是，兩年之中，刊物醞釀而終不能成熟，郭沫若在時事新報撰稿時，不再過問刊物的事，由在東京的張資平、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人在繼續籌備，並拉了在京都的留學生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徐祖正等人為助。這也就是以後創造社的主要人馬了。詩人郭沫若的新生命底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春天，成仿吾受了上海大東書局的聘，由日本回國，郭沫若抓住這個機會返國找職業，這是四月一日，他的大學還未畢業。

成仿吾受大東之聘任文學主任，月薪一百元，不過到了上海之後，大東並未發給他聘書和通告起薪，郭沫若也未找到職業，成仿吾請他到杭

州玩了一次，便把大東的職位讓給了郭沫若，自己跑回長沙，到兵工廠內去幹本行了。這一段事，郭在自傳上寫着：「仿吾在東京接到的信上，是說聘他當文學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編輯所已經半個月，沒有給他聘書，也沒有說上月薪的話。那書店老板趙南公——其實趙南公並不是大東書局的老板，那書局是政學系的人辦的，趙南公只是經理，後來政學系的幾個份子成了『大人物』，沒有再管書局的事，那書局於是便成了宋朝的江山——看見了我的商品價值還不壞，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終沒有接過他的聘書，始終沒有正式受過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兩三個禮拜，一看見那書局情形沒有容納下我們兩人的地位，他便決心回長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給我辦。仿吾說：長沙有一座兵工廠，廠長是東大的同學，他到那兒是有事可做的。」不過他並未受到大東的重視。

由以上一段話，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心態。在郭沫若未成名之前，大東已與商務齊名，更勿論後來的中華書局，只是大東沒有現代的經營管理理念，商務崛起後，大東就變成落後保守的形象，何致要郭某為大東的招牌？這真是夜郎心態罷了。

「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左翼作家聯盟」都對中國的文學有深遠的影響。「創造社

——這個社團究竟成立於何時，很難說出一個確切時間。一九一八年八月下旬，郭沫若、張資平在日本博多灣談話已有此項提議，他們寫信給郁達夫、成仿吾、田漢諸人，請他們加入，他們也同意了，一九二〇年成仿吾等在東京郁達夫的宿舍開了三次籌備會，決定辦一個社團刊物，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創造季刊」創刊之日，可以視為「創造社」成立之期，因為他們始終未宣布過「創造社」於何時成立。「創造社」成立前後，已與「文學研究會」發生筆戰，繼之又與「太陽社」聯手圍剿魯迅，後來以這兩個社為基幹，成了「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既以魯迅為領袖，「創造社」的準領袖郭沫若自然不便屈居於「敵人」之下去做一個盟員。

就這樣，魯迅口中極左的「創造社」準領袖便被擠在「左翼作家聯盟」的門外了。

不僅這樣，這兩個都自認是中國文學領袖的人物，直到老死也沒碰過面，足見兩個人的心胸的一般了。郭沫若「才子加流氓」的封號，就是在論戰時魯迅的名言。

有趣的一筆風流賬

這些天寶遺事是說不完的，在下也不是白頭宮女，犯不着再抄故紙。我們還不如再翻翻郭沫若的風流帳要有趣得多。

中共的文人中，魯迅去世後，被封為「革命先知，青年導師」，為第一號人物；郭沫若善於逢迎拍馬，在紅朝做文藝官，雖然在文革期間，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自我批評的文章說：「我

的一切著作應視為廢紙而燒掉。」五個兒子中的一，以「走資派」被鬥自殺，郭沫若則以獻詩江青而身免。在毛澤東的文藝弄臣中，郭沫若的地位僅次於魯迅，曾歌頌過史達林、毛澤東，而列為四大文丑之首，依次為老舍、臧克家、艾青。不過在那種環境之下，作家要想有骨頭也難。對郭沫若的批評與他的出身，及其無恥的嘴臉，讀者早已耳熟能詳，不必多費篇幅，我們只想談談他戀愛的種種，把它集中起來敘述，他幾乎是郁達夫筆下沉淪者的化身。

最早他姦淫的女人是他的五嫂，在中學時代則為同性戀者，從他的自傳中可以看出，他既扮演○號，也扮演一號。（已見前述）。

陳敬之來臺後曾為一系列文史方面的著作，他從「南社」到三十年代，旁及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學活動，都如數家珍。

因為他服務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資料應當可靠，當時三十年代尚在禁期，對於後輩無異開了一扇後窗，透過他的敘述，去了解三十年代文學活動，是難能可貴的。

陳敬之列出與郭沫若戀愛有名有姓的女人，有如下幾位：

明媒正娶的結髮夫人張瓊華。
與「五嫂」發生淫亂。

日本夫人安娜。

田漢的情婦胡萍。

陽翰笙的太太唐棣華。

女朋友彭亦蘭。

第三任太太于立羣（藝名黎明健）。

女友于立忱（于立羣的親姐妹）。
臨時的女友更是不勝計數。陳敬之說：郭沫若選擇女人，是以貌美而富有誘惑力者為之，年齡則又其次。至於對方究竟是什麼身分，以及他和她之間亂來一陣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後果，他是全不管那些的。

始亂終棄不計後果

這話可以用他和于立忱相愛為例證。

在日本，他已經有了一個日本婦人安娜，而且生了孩子，但薄有文名的郭沫若却瘋狂的追求于立忱。

據謝冰瑩在「于立忱之死」一文中，談到郭沫若與于立忱的戀愛，真是轟轟烈烈，而又是典型的始亂終棄，最後于立忱自殺了結此段孽緣。

當時謝冰瑩也留學日本。據她說，于立忱是「益世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人長得極為標緻。她到東京未久，郭沫若便追求而戀上。為了達到目的，郭某曾信誓旦旦的說：他與安娜的結婚，是因留學異邦，寂寞而鑄成的大錯，只要于立忱答應嫁他，立即與安娜離婚，其實那時郭沫若在日本雖然有公費三十二元，仍不够生活，那個家，全靠安娜替人洗漿來維持。

男女一要好，可能之一便是懷孕。那時代的避孕，沒有現代那麼方便。于立忱懷了郭沫若的孩子以後，他却根本沒有與安娜離婚的意思，一切海盟山誓都是假的，于立忱只好以割盲腸為掩飾住院墮胎，最後以自殺結束了這段戀愛。

當然于立忱也不是很正經的女孩子，她在「

益世報」工作時，即與「益世報」的老闆有了婚外情，被正室發現，而不得不派她以駐日本特派記者的名義去國，她與郭沫若的戀愛，至少已不是她的第一次了。

官僚嘴臉越過土霸

抗戰軍興，郭沫若逃離了日本，幹上「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實現了當年他在成都所做的當官美夢，終於由土霸王到政府的大吏。孫陵在「浮土小品」那本書裡，對郭沫若的官僚嘴臉，描寫得非常深刻。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任內，陽翰笙是主任秘書，孫陵為機要秘書，但郭沫若却並不十分相信陽翰笙，私章都交給孫陵，很多大事的決策，也以孫陵的意見為主。所以孫陵的話縱然有點浮誇，還是有相當可信度的。郭沫若掛的是少將銜，在北伐軍政治部他曾出任過副主任之職，但他的官癮很大，筆挺戎裝，昂首闊步，威風凜凜。那時的軍階，並不是像現代一樣，需要完整的資歷，基於抗戰的需要，軍階是只要一紙命令委任了事。不少共產黨員在第三廳，都以文人領受過不同的軍銜。可以說，軍階的授予是十分浮濫的。

畸情愛上了于立羣

在政治部，郭沫若身邊已經沒有女人了。於是他追求于立忱的姐姐于立羣，即以其對妹妹于立忱的愛移情作用，來騙取于立羣的感情，而于立羣竟然接受，也可算得上是一段畸情了。于立羣藝名黎明健。說起這個藝名，頗為有

趣。他拜音樂家黎錦暉為義父。湘潭黎家出了不少人才，黎烈文、黎錦明、黎錦熙等都有文名。于立羣是「梅花少女歌舞團」的團員，原和該團薩克斯風手周泰雄同居，與郭沫若結婚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挺着個大肚子進禮堂，但郭沫若還大請其客，連第三廳的炊事兵、勤務兵都不能幸免。禮金是由第三廳的財務人員按階級在薪水預扣的。黛郎這個說法未引出處，想是親身經歷，因為那時他是第三廳所轄的「中製廠」的演員，當然是第一手資料。

因于立羣嫁給郭沫若以後，第三廳即派黎錦暉為「中製廠」廠長，鄭用之為主任秘書。按鄭用之先生現在在臺灣，一九六〇至七十年代仍擔任「中製廠」的顧問。黎錦暉固然不是鷄犬，但這個派任却有鷄犬升天之嫌。孫陵在「浮世小品」裡記載陽翰笙的太太唐棣華與郭沫若眉來眼去的醜態非常傳神。陽翰笙的家就安置在他們辦公室的對面，唐棣華常常派她的小女兒當郵差，送紙條給郭沫若。那些紙條多半寫着：「剛開了個西瓜，等你來吃。」

孫陵說：「總是三言兩語，說良心話，我沒見郭沫若拒絕過她的邀請。」陽翰笙憑這種關係，上班十點鐘才到，也在郭沫若面前橫行無忌。

周旋各種「夫人」之間

北魏崔虎的升官，是以小妾侍候劉騰的結果，其實在歷史中這種事例不少。陽翰笙是否實行了性賄賂，無法妄斷。但是陳敬之却說：

「自郭沫若的『女人經』而言，他原

來是經常在『誘之不問對象，奪之不擇手段，棄之不顧死活』的原則下，來玩弄一切的女人。

「自郭沫若的所謂『夫人』而言，他就先後娶了三個之多。其中明媒正娶的，有他在成都中學時期的『結髮夫人』；後來與他宣佈同居的，先有他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東洋夫人』；繼之又有他在『回國請纓』時期的『抗戰夫人』。此外和他明來暗往或始亂終棄的『臨時夫人』，更是難以統計，也無法統計。即就其中有事實足據且為人所共知者來說，也有令人指不勝屈之感。例如，在他的至親中，就有他的『五嫂』；在他的朋友中，就有田漢的情婦胡萍；在他的部屬中，就有陽翰笙的太太唐棣華；在一般所謂交際花中，就有彭亦蘭、黎明健……這一羣女人都曾被郭沫若勾搭上，且發生過不三不四的曖昧關係。」（見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郭沫若對女人，據陳敬之的說法，是以貌美而又富有誘惑力者為主；年齡則又其次。至於對方究竟是個什麼身分，以及他和他之間亂來一陣之後，將會發生什麼後果，他是全不管那一些的。觀於上面所舉述的許多事例，即可概見。他這一套荒唐透頂的搞法，不僅對他的「臨時夫人」為然；就是他的「正式夫人」，也不例外。

在郭沫若的三個夫人之中，除了那位年輕而又工於心計的「抗戰夫人」名叫于立羣，婚後安然無恙的做着紅朝的新貴夫人之外；其餘如他的「結髮夫人」和「東洋夫人」，就先後給他遺棄得一乾二淨了。尤以他那位「東洋夫人」安娜女士，一生為了他受盡委屈和吃盡苦頭，最終不免走上人世的悲慘道路，說來也就委實令人為之膽寒！

以上是陳敬之的評論，就郭沫若與女人搞七捻三的關係，再加印證，應當是不冤枉他的。

安娜前往大陸尋夫

日婦安娜在抗戰期間，曾經到中國來找過郭沫若，他不但見，反而要利用權力，把安娜當間諜來辦，後來還是西安的一些朋友湊了旅費把安娜送回日本，大陸淪陷後，原名佐藤富子的安娜又來到中國。中共把她安置在大連市高爾基路的一座小洋房裡。據一九八六年六月「爭鳴」李肆的「一個郭沫若遺棄的女人」說：「八三年，她出任全國政協委員，並沒有引起新聞界多大注意，想不到今天，她和郭沫若『純潔愛情』的文章和書籍不斷地出現在讀者面前。這一切，是郭安娜始料不及的，情形不像記者所宣揚的『埋沒的人尤其值得敬重』。郭沫若七八年去世，半年之後，他太太于立羣病逝。可以想見，如果于立羣今天健在的話，郭安娜是不會有出頭之日的。」

中日戰爭期間，郭沫若從日本逃回中國後，日本會把安娜囚禁了一個多月才釋放。一個孤身女人，帶着五個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本來就够慘了，時值中日戰爭，郭安娜作爲抗日名士郭沫若的夫人，精神的屈辱處處折磨她，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連她妹妹因有個異國姐夫，聲章也被收回。

李肆說：戰爭結束後三年的一九四八年，郭安娜再也按捺不住渴望的心情，決定到大陸去找郭沫若。十一年來，除了那年收到一封郭沫若平安到達上海的電報外，幾乎音信全無。此次出走，郭安娜最緊張的是郭沫若留下的一些未發表的手稿，她知道這是珍貴的東西。當時有一些頗有頭面的人找上門，出高價來買這些手稿，儘管郭安娜當時一貧如洗，也沒有答應。她要用這些手稿作見面禮，想親手交給郭沫若。

我的心上天都知道

一九四八年安娜終於帶着孩子離日經臺灣到達大陸。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她這個棄婦並不能踏入夫家的大門。前來看望她的，是早年在廣州相識的周恩來，並不見郭沫若的影子。郭安娜明白了，她與郭沫若的夫妻情份已盡。最後，文稿全部交給了「國家」。周恩來指示，把安娜安排在大連市隱居，直到「文革」才曝露了出來。她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小兒子被打斷骨頭，最後去了日本。這件事使她寢食難安。安娜或許還不知道，郭沫若和于立羣在那段時間的遭遇更慘，他們兩個兒子在運動一開始就相繼去世；北京

大學還專門開闢一所房子，用來貼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于立羣兩個姐妹也死於文革；甚至到了七四年過年的時候，郭沫若還遭圍攻，說他是「尊孔派」，結果當場病情惡化送院搶救。那一年，他連續發病，住院七次。于立羣本人也進了醫院，好像報應似的，他們領受了不下於郭安娜抗戰時期所受的屈辱。

郭安娜爲了年輕時代所執着的愛情，幾乎失去了一切幸福。也許上天是公平的，給了她許多人難以企及的高壽。目前這位古稀老人同兒子媳婦住在一起，自己動手生爐子、煮飯菜，不過胃口很小，每月三斤糧食就夠了。

談起往事，她的語調並沒有悲傷，也沒有眼淚，彷彿這一切並不會發生在她身上。她說：「我爸爸是耶穌教的牧師，我的心也是在天的，天都知道的！」

機會主義人際關係

郭沫若的寡情，不僅是對安娜這件事，對「創造社」的同人也十分寡情。史劍之所以說他是位機會主義者，是從他行事作風與人際關係上作此判斷的。我們都知道郭沫若是由「創造社」起家的。但他對「創造社」的幾個臺柱像郁達夫、張資平和田漢他們，都沒有好評。其中尤以郁達夫和他的關係總算够密切了，但他們兩人却會一度因大鬧彗扭而至於斷絕往來。

現在我們轉引陳敬之對郭沫若的批評作個結論。陳敬之對他有以下的看法：

「他對『創造社』以外的人，也均無好感。

以胡適爲例，他和胡適的關係，一忽兒恨之入骨，一忽兒又擁抱他。這種『昏夜乞憐、白晝驕人』的矛盾表現，也只有內無所主而外有所求的投機主義者，才能行所無事，恬不爲怪。至於他因懷恨『文學研究會』之『壟斷文壇』，而在『創造十年』中，不惜以輕薄之筆，對矛盾、鄭振鐸大事奚落，則更是忌妬與自卑的綜合，而不僅基於『文人相輕』的積習而已。

「再者就他和魯迅的關係來說，則更充分的表現了他的機會主義的色彩。他和魯迅之糾纏不清與攻訐不已，論時，則由來已久；論事，則並非一端。而其中尤以魯迅罵他爲『才子加流氓』（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而他『回敬』魯迅爲『有筆如刀』的『紹興師爺』（郭沫若『創造十年』）的那一幕，則更爲新文壇人士所共知。

「雖然後來由於討論什麼『國防文學』，魯迅爲了爭取羣衆，以打擊共黨文特份子周揚、徐懋庸爲中心的領導系統，曾一度和他携過手；但此之所謂携手，只是表面上彼此不再糾纏和攻訐而已。魯迅死時，他一個電唁都沒有。但在魯迅既死且成爲中共的偶像之後，他却又變成了魯迅的崇拜者且捧之不遺餘力了。他之恩怨敵友，悉決之於個人的利害，這更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雖已蓋棺尚未定位

郭沫若已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平去世了，享年八十六歲，結束了他的生命，至於蓋了棺，尙未定論。他的文學地位、政治作爲，尙有待史學家來定位。